

民主的经济理论

安东尼·唐斯 著
谢岳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民主的经济理论

[美]安东尼·唐斯 著

谢岳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的经济理论/(美)安东尼·唐斯著;谢岳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2

书名原文: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ISBN: 7-207-05845-4

I. 民… II. ①唐… ②谢… III. 民主的经济理论 IV.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878 号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Copyright © 1957 by Addison -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 © renewed 1985 by Anthony Downs.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in this book are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so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Addison - Wesley Publishing, Inc. 75 Arlington Street, Suite 300, Boston, MA, 02116

民主的经济理论

著者:(美)安东尼·唐斯 译者:谢岳

责任编辑:朱玉升 封面设计:N时代工作室 责任校对:汪生

吉林人民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0.5 字数:32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7-05845-4

版次:2005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3500册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致 谢

像所有原创作品一样,这项研究同样包含着大量他人的思想和努力。我应该特别感谢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他自始至终地指导与纠正书中的一些想法,并且贡献了许多十分精彩的观点。我也应该感谢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梅尔文·W·里德(Melvin W. Reder),他们两位阅读了初稿、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些建议已经被充实到书中。另外,我要感谢多罗茜·威尼(Dorothy Wynne),她帮我校正了第十章第一稿中若干错误;朱丽叶斯·玛格丽斯(Julius Margolis)积极而耐心地参与该主题的最初讨论,促使我着手此项研究;卡罗琳·扬女士(Carolyn Young)和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处理了大量的打印和编辑工作。最后,我应当感谢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是他们的资助才使此研究成为可能。当然,文中一切错误由我一人承担。

安东尼·唐斯

1956年5月于斯坦福大学

序 言

本书试图通过分析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来阐述民主国家是如何统治的这个主题。这是作者为自己选择的抨击民主理论问题的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它于我似乎也不例外。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在那些非共产主义世界看来是民主国家的显著特征，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是，统治问题与通过竞争控制政府问题两者没有什么区别，从本质上讲，统治意味着让人民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那些拥有正式权威的人，如果他们想真正进行统治的话，必须弄清楚哪些人支持自己、哪些人反对自己。在现代民主国家，获得这些情报和进行选举宣传是政党政治的全部，或者说是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如果民主理论无法说明上述事实，这个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民主政府的行动就没什么帮助。

当唐斯将政党政治置于他的民主思想的中心位置时，他的民主理论与其他的政治学家想比就有着天壤之别。他的全部努力就是要说明政党与选民的所作所为，他系统地运用选民和政党行为动机与环境假说，有力地解释了民主政治。他可以用经济来解释民主，也就是说，试图用十

分有限的事实和假说说明民主现象。他也同样关注所有民主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或其他某个民主国家政党政治的特点。唐斯这本书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能够让过去的其他有关政党活动的描述变得过时而乏味,相反,对大量过去和未来的研究发现来说,它仅仅是个开始。

唐斯假定,所有政党和选民在追求某些特定目标时能够理性行动,事实上,正是这个假定赋予他的理论以解释力。我们当中的多数人是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批判力的孩子,“他那么做是因为他认为,那是得到他想得到的最佳方式”总是让我们想起自己太浅薄,但是,就像公司放弃理性追逐利润就不能成其为公司一样,放弃以理性的方式追逐选票的政治家就不成其为政治家。选民的行为可能是无知的,但是,那绝不等于非理性的。当政治理性行动的假说被运用的时候,它必须能够得到反经验的有力证实,唐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即使是在序言中我也不敢说,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没有一丝瑕疵,但是,我敢十分诚恳地说,至今为止没有几本书能够像它一样给我极大的影响。从今以后的若干年里,如果唐斯的著作没有被看作是政治研究进程中的一个起点,那将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它的影响已经相当广泛,而且还会继续扩大。

小斯坦利·凯利

1965年5月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

目 录

致 谢

序 言

第一部分 模型的基本结构

1. 导 论 3
2. 政党动机与政府功能 22
3. 投票的基本逻辑 38
4. 政府决策的基本逻辑 54

第二部分 不确定性的一般影响

5. 不确定性的含义 81

6. 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政府决策 86
7. 作为获取选票手段的意识形态的发展 100
8. 政党意识形态的静力学与动力学 119
9. 联合政府下的理性问题 149
10. 政府选票最大化与选民个人的边际均衡 171

第三部分 信息成本的影响

11. 知晓过程 213
12. 理性公民如何降低信息成本 226
13. 信息回报及其减少 243
14. 理性弃选的原因与影响 264

第四部分 引申含义与假设

15. 政府行为的经济理论评论 283
16. 本理论可证明之命题 299

参考书目

译后记

第一部分

模型的基本结构



對聖本基補聖對

第一章 导论

在世界各国，政府主导着经济活动：政府的开支决定了是否能够充分就业；政府的税收影响着数不清的决策；政府政策控制着国际贸易；政府的国内规制扩张至几乎每一个经济协定。

但是，在经济理论领域，政府的角色并不都是与它的主导性地位相对称的。事实上，在经济学的所有领域，最近的思想已经更多地集中于政府对私人决策的影响，或者说在经济集合中的政府份额。然而，对于理性政府的一般的但却是实际的行为规则的研究——类似于传统的理性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规则——进步甚微。结果，政府没有被成功地演绎为平衡理论中的私人决策者。

本书就是为民主政府提供行为规则的一种尝试，并且尝试弄清楚规则的含义。当我们在进行这种尝试的时候，我们并不想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让该领域的分析处于失败的境地，但是，我们希望开始找到其中的一种方法，同时希望找到一种理性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其他问题无法解决的理由。

I. 模型中理性的含义

A. 经济理论中理性的概念

经济学家几乎总是一致地看待决策,似乎这些决策是理性思想的结果。某些情况下如此简单化的理解对预测经济行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随意决策或者毫无关联的决策根本不会表现为什么模式。不过,只有当人类行为形成某种模式的时候,这些行为才会被预测或行为关系能够得到分析,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要假设一套行为发生的顺序。

没有任何理由来证明这种顺序是理性的,也就是说,没有理由证明自觉的目标实现是理性的。然而,经济理论已经提出自觉理性的假说,尽管像托斯汀(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和约翰(M(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这些经济学家坚决地反对这一假说。因为我们的模型是有关理性行为的,所以我们也要做这样的假设。^①

这样,预测和分析的传统方法适用于我们的模型。假如一位理论家知道某些决策者的目的,他就能够预测到他将按照以下方式采取什么行动实现目标:(1)经济学家会计算出决策者为了实现他的目标而采取最理性的方式;(2)他认为这种方式一定会被决策者采纳,因为决策者是理性的。

^① 参见脚注3,第5页。我们给理性的定义包括这样的假说:人们直接地、没有任何掩饰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除了在第三章将要讨论的一个例外。关于理性人什么时候掩饰他们的偏好的分析,参见 Kenneth Arrow 的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1), p7。像阿罗一样,除了少数评论之外,我们将选择中的“游戏快乐”从我们的理论中排除出去。

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有两个主要步骤组成：发现决策者追求的目标；分析哪种手段是实现目标的最理性的方式，也就是，需要最少的稀缺资源的输入。当理论家进行第一步的时候，他们已经设法将每个经济组织的目标缩减到一个，以便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的方法能够被发现。如果目标太多，实现那个目标的手段就会阻碍另一个目标的实现，因此，理性决策者遵循的独一无二的路线图就不可能被描绘出来。为了避免这种僵局，理论家提出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和消费者功用最大化的假说。而其他目标在经济学家看来，则是限制理性路线图实现主要目标的偏离。

在上述分析中，“理性的”这个术语不适用于组织的目标，它只适用于组织的手段。^①这与将理性定义为效率一致，也就是说，为了某个确定的输入而最大化输出，或者，为了某个确定的输出而最小化输入。因此，无论经济学家在什么时候提及“理性人”，他们都不是指那些思想过程能够形成独特逻辑命题的人，或者是没有偏见的人，或者是在感情面前无动于衷的人。在日常使用中，所有这些都可能被看作是理性的人。但是，经济学的定义仅仅指那些用最小可能的稀缺资源的输入，尽行动者所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为了阐明这个定义，让我们考虑一个有关行为的例子，一个仅

^① 我们假设，目标能够从决策者的思想中分离出来。虽然目标可以通过实现它们的过程得到改变，但是，必须允许某些目标从手段中分离出来，或者，所有的行为无序和无意义。因此，我们假设，每个决策者根据目标评价面对自己的选择方案，即使这些目标是暂时的。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 Willam J. Baumol 的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2), p. 121n

仅在经济学意义上是理性行为的例子。我们假设，一个和尚自觉地选择以获得上帝神秘思考状态为目标。^① 为了实现他的目标，这位和尚必须从他的观念中清理掉所有逻辑思想和自觉的目标寻找。从经济学上来讲，这种清理行为是十分理性的，即使按照非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定义，这种行为可能是相当的不理性，或者至少是非理性。经济理性也能够被正式地以另一种方式定义。一个理性的人总是这样行动：(1)当面对一系列选择方案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决策；(2)他按照偏好循序排列所有的选择方案，每个方案要么是优先于另一个，要么是低于另一个；(3)他的优先顺序是可改变的；(4)他总是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选择最优方案；(5)当他面临同样的选择方案时，每次他总是做出同样的决定。^② 在我们的模型中，所有的理性决策者——包括政党、利益集团和政府——表现出一致的特质。

理性因此在这里被定义为行动的过程，它不是目标。理性计划有时能够产生结果，但是这些结果远远不及纯粹靠运气获得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我们自然希望理性人胜过一个不理性人，因为随意的因素不存在了，有效胜过无效。不过，因为我们模式中的行为不能够通过它的结果来检验，所以我们使用“理性”或“非理性”术语仅仅限于行动过程，也就是手段。当然，某些中介目标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我们能够判断前一个的理性，而后者的评价则超出了我们的范围。

^① 自觉选择的目标：(1)当它们被追求的时候，不需要自觉形成；或者(2)不纯粹是自由选择的事情。第一点已经被上述事例所证实，第二点通过以下事实的得以展示：人自觉地寻找获得食物，虽然他们食的基本欲望是人的内在本质。这些自觉的选择有时在说明人的基本的、不自觉的行动时，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

^② 这些条件来自阿罗的第一和第二章的分析。

B. 当前理论研究中理性的狭义概念

然而,即使我们无法决定决策者的目标是否是理性的,但是,在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样的行为对决策者来说是理性的之前,我们必须知道这些目标是什么。此外,在设计这些目标的时候,我们必须避免同义反复的结论,即每个人的行为总是理性的,因为(1)每个行为总是指向某些目标的;(2)在决策者看来,行为的回报必须超过行为的成本,否则,他根本不会行动。

为了避免上述缺陷,我们只关注模型中每个人或集团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应当承认,我们将这些目标从人们追求的众多目标中分离出来是十分武断的。例如,某位公司经理可能为一份较高报酬而工作,因为他喜欢工作,希望有更强的购买力,因此,如果我们将希望有更强的购买力视为他行动的唯一目标,那就大错特错了,并且是十分武断的。不过,这是经济和政治理性研究而不是心理学研究。因此,即使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理学能够找到自己合适而重要的位置,但是,除了第二章会简单涉及外,我们不会在整体研究中考虑它。

在我们的研究中,选举的方法将阐明理性的这个狭义的定义如何。我们假定,在民主政治中,选举的功能就是选择政府,因此,选举的理性行为就是指向这个目标而不是其他。让我们假定,某个人出于政治理性而喜欢 A 党,但是,他的妻子对于他不投 B 党总是感到不快。如果他认为博得妻子的欢心比将选票投给 A 党更重要,那么这个人的行动对他自己而言则是完全理性的。不过,在我们的模型中,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不理性的,因为它为了非政治目的而使用了政治的手段。

因此,当我们讨论什么行为是理性的时候,我们并不考虑每个

个人的人格因素。我们不考虑由于行动者动机的复杂性以及与他感情需要密切相关的全部生活因素而导致的行动者的目标的差异性,相反,我们借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理性消费的观点。与维布伦和其他经济学家批判的并不知名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相对应,我们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是选举中的“平常人”(average man),是民主模型中的“理性公民”。

因为我们允许这个政治人无法预知未来,所以,他不像功利的经济人那样有着机器一般的、精确的计算能力,不过,他仍然能够从人的全部人格特征中独立出来。我们假定,这个政治人能够以一眼盯着收益、另一眼看着成本处理每个问题,他具有精巧的平衡收益与成本的能力,具有强大的追求理性的欲望。

毫无疑问,我们的模型受到假想人(artificial man)制约这个事实,限制了将假想人的行为比作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在真实世界中,有些人会用投票来取悦自己的妻子,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政治偏好。这种行为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经常被认为是高度理性的。实证研究在结论方面总是一致的,它们认为,与遥远的经济或政治福利考虑相比,初级团体中的适应对每个个体而言更加关键。^①

但是,我们必须假定,人的行为主要趋向于长远经济或政治福利考虑,否则,所有的经济或政治分析都变成了初级团体社会学的纯粹助手了。然而,几乎所有的初级团体都受到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强烈影响,因此,我们得暂时地将每个初级团体的特性看成是受到其他初级团体相反特性平衡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定义一般条件下的理性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歪曲事实。

^① 这方面总结性研究参见 Elihu Kartz 和 Paul F. Lazarsfeld 的 *Personal Influence* (Glenco,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55), 第一部分。

我们的模型结构将揭示理性行为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精确本质,但是,在考虑这个结构之前,我们必须澄清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辨别理性人的错误行为与非理性人的正常行为?假如理性真正地意味着有能力,是不是无能的人行为总是不理性的,或者,理性人也会行动无效?

C. 不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基本功能

要清楚地辨别理性的错误与不理性的行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首先认为,一个错误的理性人至少能够准确地把握住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而不理性人则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大量无意识神经症案例掩饰了这个标准。即使是那些无望的精神病人,如果只告诉他们扭曲的现实知觉,其行为经常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因此,目的不是一个合适的特性。

在我们模型数量有限的目的中,纠错能力是一个辨别不理性行为错误的很好的手段。一个犯错的理性人会停止犯错,如果(1)他发现他的错误是什么,并且(2)改正错误的成本要小于收益。同样情况下,一个不理性的人则无法纠正错误,因为他有不合逻辑的倾向;因此而重复犯错,他的行动主要不是受到成功实现目标的欲望的驱使,因此,他总是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他有能力。

这个方法在区分不理性的错误时有两个缺陷。第一,这个方法经常需要假设验证,因为错误的理性人总是发现不了他们的错误。如果一个人继续犯错误,我们如何辨别他是否是不理性的或仅仅是缺少信息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回过头去,弄清楚他的目的呢,而我们已经讲过目的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这个缺陷击中了社会科学的基本要害,即社会科学无法以实证证明它的所有论断。毫无疑问,这个缺陷也削弱了我们的观点。